



英格拉·斯特朗德贝里：

黑夜里透着星光， 灵魂已译成图像

□王 晔



英格拉·斯特朗德贝里

英格拉·斯特朗德贝里 (Ingela Strandberg, 1944-)，这个“赤脚行走/穿过诗行”的女孩如今80岁了，她生命的大部分时光生活在她的出生地——瑞典南部哈兰德省的一座小农庄。1973年她以童书登上文坛，1975年推出诗集《风中的歌》，迄今有15本诗集。另有民谣专辑《永远别让他们带走你》。这位“诗人中的诗人”屡获重要诗歌奖，如瑞典学院贝尔曼奖、沃纳尔·阿斯彭斯特罗姆奖、古斯塔夫·福楼丁协会诗歌奖、瑞典广播公司诗歌奖，今年斩获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瑞典学院北欧奖。

斯特朗德贝里的创作受哈兰德自然和文化景观影响，受瑞典自然抒情诗传统的熏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984年的诗集《一间为夜晚的房间》是一个里程碑，一扫早期作品里的“主义”倾向，打开了自己的诗歌景观。那里充满生命和欲望，也飘荡着黑暗和死亡，“风景拥有了我，打开了/我，再也无法关闭我”。

“夜人”

斯特朗德贝里说，思绪常在梦中涌现。她起身带着它们走动，不急于书写。早上醒来，一切都还在就值得创作。“夜”是灵感的发动机，她据此构筑着为夜晚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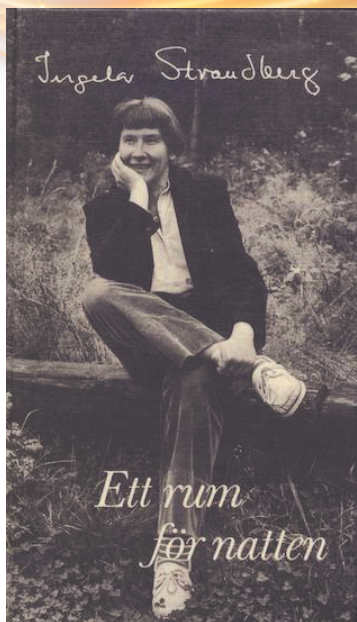
《一间为夜晚的房间》里有刽子手、小丑和妓女，有牛有马，有铁路、沼泽、田野，有太阳和星星。外部风景与内在心灵相通。夜容纳了存在的一切。美的瞬间有苹果花和越橘叶，更有死亡。这是收容夜的房间，而夜是存在的避难所。自然从未被驾驭，在外部也在内心。生死熔合。沼泽里的“我”是自然的一分子。从个人经验出发的诗指向生命的特质。斯特朗德贝里懂得夜的密码，更没忘记儿时听说的“夜人”。

“Nattmannen”是瑞典文“夜”与“人”的组合。这个词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哈兰德一带原属丹麦，16世纪初，丹麦国王已制定职业规定，夜人住在特配的与社区隔离的小屋，在夜间帮刽子手清理尸体，埋葬自杀者和死了的动物，杀马并剥马皮，清理烟囪和马桶等。夜人“不洁而可耻”，若父亲干了这活，儿子女婿也只能如此。人们对他们唯恐避之不及。诗集《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的苍鹭》(2002)中，斯特朗德贝里写过“夜人”：

“夜人，带我走/我站在你小屋前/那里紫丁香的外套/已破烂不堪，告诉我/一个人如何/被打倒了还能站立，你，剥皮者的儿子，自杀者/和狗的掘墓人，被选为/处理腐烂的，你，/遗忘的承载者，让红/砾石染色，那里葬着自/杀者的骨头，告诉我如何/承担自己的羞耻，一滴/都不许溢

在弗朗茨·卡夫卡的文学生涯中，1914年《审判》的创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与菲丽丝·鲍尔长达两年多情书往来后，两人的关系似乎是自然而然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一年的6月1日，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订婚仪式在女方位于柏林的家中举行。对于渴望摆脱父母、开始一种独立生活的卡夫卡而言，这不啻人生的重要一步，然而仅仅半个月之后，婚约就宣告破裂。对这一事件加以回溯，不难发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女方对自身家庭状况有意无意的隐瞒，两人在住房、家具等琐事上的意见分歧，女方女性友人插足导致的对忠诚度的怀疑，以及卡夫卡一直以来对写作生活绝对私密性的坚持，等等。面对这一结局，卡夫卡感受到的并非过度的悲伤，而是对自己“完全的绝望”，乃至这种绝望映射到了《审判》中。半个多月后，卡夫卡开始以绝对的热情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以沉浸式写作生活寻找“一种内心的真实”，并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人生，而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已然在耳畔响起。

作为卡夫卡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二乐章，《审判》在创作上有着独特之处。8月尚不过半，已经找到题材方向的卡夫卡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写作方式，制订了相对明确的计划，几乎是同时完成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创作。在第一章中，银行高管K在有一定标志意义的三十岁生日清晨，被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抛入人生的低谷，而在一个月前，卡夫卡刚满三十一岁；在最后一章中，K以近乎耻辱的方式，被杀死在矿场上。无妄之灾在前，绝望结局在后，作家以这种鲜明无比的书写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做了悲观的反映，同时也对未来的生活做了预言性的想象。随后的半年，卡夫卡人生中第一次独立生活于父母的视线之外，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去填充故事开始与结局之间巨大的空间，然而这一努力仍以失败告终，正如他自己还是要离开暂时的相对独立状态，回到父母身边，做一个“永远的儿子”。而在《审判》之前，未完成的《美国》将少年卡



《一间为夜晚的房间》



《捕捉一只鸟》



《我的风帆无处可至》



《夜人》

出，教我记住/比那/存在于一切之中的尖叫更多的东西……”

诗人长期聚焦儿童、酗酒者和老人，关注弱者和受害者，因为自己也曾是弱者和受害者。对夜人的聚焦是这一关注的体现。她写道，“我从未感到幸福/我需要你，夜人/我是你的小女仆/我拿泥土填满自己/而后沉入沼泽。(这是一种/无人理解的纯净”。诗集《捕捉一只鸟》(2018)中也出现夜人，带着被剥夺的人高贵的姿态和奇特的力量。诗人超越鄙视，丰富夜人的情感和欲望，甚至甘愿做他的仆人。2020年更推出诗集《夜人》，“如今，他对我来说如此真实，以至无法将他的耻辱与我的区分开。在我的诗中，我将夜人任命为卑鄙大师。我让他为我始终感受到的、那些时不时用相同手段将人与人分开的一切做出反抗”。

在斯特朗德贝里的不少诗歌中，“候车室”的意象是现实和虚幻的过渡。《夜人》也有候车室，无人等候，远处有狗的吠叫和牛的咆哮，“好像一切正常，好像车停止了漫无目的的行驶，通往循环轨道”，“我”漫不经心地归来，意识到现实已消亡，思想已湮灭。夜，候车室成了天文台，星团守护“我”，“我”引导内心的野兽走向远处的牧场。夜途中，刽子手走在“我”身边，护“我”的安全。“我”见一群饥饿的豆娘鼓动纤翅飞越水面。候

车画面闪回，雨落。今晚再无车，即便有也再无人下车，天鹅飞过。“我”明白，所有的事物将一个接一个离开。唯一危险的是时间及其消逝。“我”不鄙视夜人，不鄙视欲望和饥饿，甚至不鄙视自己，夜人教“我”不去改变任何事物。“我”答应只要他对我说话，“我”就让自己冻成冰霜，成谜，却永不屈服。在这夜行图里，还有月下的马、如刀的冷月、冬天开花的丁香，有麋鹿，有不知生死的、自我的模糊意识，带着哥特元素的画面富含意象、感性和宇宙观。神话的加持帮助焦点从个人转向永恒：“自纳西索斯之后我知道/池塘的水/强化我的血”。光明和黑暗的并存丰富了诗的图像世界。

“捕捉一只鸟”

精灵教“我”如何柔软地倒下，如何在迷雾中播种，如何隐藏困难的爱。“我”喜欢沟渠，喜欢它们浑浊的水、隐藏的暗流和基本的生存建议。“我”喜欢老旧的车库，森林和雪的记忆，喉咙里的欢呼，“我”漫不经心地归来，意识到现实已消亡，思想已湮灭。夜，候车室成了天文台，星团守护“我”，“我”引导内心的野兽走向远处的牧场。夜途中，刽子手走在“我”身边，护“我”的安全。“我”见一群饥饿的豆娘鼓动纤翅飞越水面。候

海。有时，“我”从小麦和老鼠那里获得关于自我的虚妄的启迪：

我站在一片抛光的黄铜海边
自我是一出神话
小麦是真实

一只老鼠
跑进田里
而后消失

消失非常容易

一幅神秘而虚幻的场景。抛光的黄铜海或为麦田给“我”的幻想。“我”的意识和存在是虚幻大世界里的微尘。巨大的荒诞中突现小麦这一现实元素。老鼠跑进麦田且消失，似乎只为了在“我”面前演绎存在，演绎个体存在和现实经验无法避免的短暂性。所见所感将于时间中消逝，自我的神话不堪一击。

《捕捉一只鸟》由两组长诗组成，第一组以“蛇蜥”为题。蛇蜥和精灵在，绝望与和解也在。“我”想摆脱束缚，静谧里上演着紧张的戏剧。而孤独难以消解，像刀刃高悬，随时会落下。人在奔跑也在迷失。玄妙而抽象的话题丝滑地以诗的形式得到表达。穿行中的“我”体验不安、恐惧、幽闭及挣脱的欲望。平凡的日常与蓬勃的自

卡夫卡，站在专为自己而开的人生门口

□韩继坤

尔·罗斯曼抛在了通往看似光明、实则充满变数的未来的旅途上；在《审判》之后，篇幅更大的《城堡》让土地测量员K奔赴目的地的诸般努力戛然而止，尽管卡夫卡曾经为之设想过一个较为明确的结局。一生中总共创作了这三部长篇小说，但都未能真正完成。这种“半途而废”，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对自己人生的无可奈何。

对卡夫卡而言，一生中最重要的束缚或许就是复杂的父子关系。这或许也是文学史上最知名的作家父子关系之一。作为一位自幼家贫，堪称白手起家，最终生意成功的商人，赫尔曼·卡夫卡身上自然不乏成功者的特质，自信、果断、威严，但同时，这些特质又走向了极端，变成了自负、专横、粗暴，让他对整个家庭保持着绝对的统治，也让儿子在成长过程中饱受心理折磨。他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喋喋不休地要求孩子对来之不易的富裕生活感恩，还是在孩子哭闹时采取简单的体罚手段，或者不考虑孩子的承受能力，对性直言不讳，都让作为儿子的弗朗茨·卡夫卡对父亲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这种阴影甚至伴随了他的一生，影响着他的众多人生抉择。在写于1919年11月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顾了父子二人之间三十多年的纠葛，其中有感激，有失望，也有恐惧和控诉，是对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所做的精神剖析，同时也是对与父亲达成和解的渴望。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一封信母亲看过，妹妹看过，甚至情人也看过，却未能被父亲读到。卡夫卡千言万语的倾诉变为沉默，渴望始终无法实现，正如那无法抵达的城堡。

这种复杂的父子关系在卡夫卡作品中的表

露，高峰的出现还要前溯七年，即1912年。这一年的下半年，卡夫卡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9月和11月底至12月初，他先后写下了两部重要的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9月22日，即犹太人赎罪日这一天所进行的《判决》的创作，对于卡夫卡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晚上十点至第二天清晨六点，八个小时里，卡夫卡从零开始完成了整篇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而且整个过程极为顺利，堪称他理想中的创作体验，一俟画下最后一个句点，他便深信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后来发表时也几乎未再加以改动。《审判》以一个外在人物引发家庭内部的一场战争，儿子最初表现出的对生活的掌控力，在看似处于退隐状态的父亲的攻击下土崩瓦解，最后他甚至遵从父亲的判决赴死；作品后半段的剧烈转折，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展现了父亲相对于儿子的绝对权力。到了两个月后的《变形记》，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尽管儿子前期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看似拥有了一定的权力，但在他变形之后，权力天平很快向父亲倾斜，儿子又成为父亲可以任意拿捏的对象，而其最后的死亡，部分也是由于父亲直接伤害。不过，这种父子之间的对立乃至生死冲突，在卡夫卡后来的作品中却渐渐消隐。

逃离父亲如山一般笼罩的阴影，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更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所一直追求的。无论是说生活进入作品，成为作品探讨的话题，还是认为作品影响生活，改变了现实的走向，两者之间的共通性是毋庸置疑的。逃离与反抗的过程伴随着失败与失望，但也有意外的收获。按照父亲的安排，卡夫卡按部就班读完中学并成功考入大学，怀着在当时犹太人获准从事的职业范

围内寻得一份工作的朴素想法，他选择了化学作为专业，但该专业出乎意料的难，他又转学法律，并选修日耳曼语言和文学类的课程。这些选修课却引发了他真正的兴趣，他一度考虑再次转专业，但在坚持实用主义并对市民阶级前景抱有渴望的父亲强烈反对下，他不得不继续法律专业的学习，最终以博士学位毕业。按照彼时法学毕业生的惯例，卡夫卡在法院实习了一年之后，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开始了其保险行业法务人员的职业生涯，很快又在朋友父亲帮助下跳槽至国家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这家官方性质的机构是极难进入的，但卡夫卡选择它并没有太多复杂的考虑，仅仅是因为前一份工作过于繁忙，夺去了他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新工作可以让他在下午两点就能下班走人，然后有大把时间用于写作。无论如何，工作之后的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有了相对于父亲的独立性。

经济上的独立可以让人在更多事务上拥有话语权和自我决定权。卡夫卡首先在职业上走了一条与父亲不同的道路，因而得以摆脱接手家族生意、完全受控于父亲的可能；而其国家机构专业人士的身份无疑也部分满足了父亲那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渴望。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半，一半应对外界施加的压力，处理现实之事，一半听从内心的声音，书写灵魂诉求——卡夫卡这种生活方式不能说不成功，因为他的职业成就可观可点，受到同事和上司的一致赞赏，是公司业务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其文学成就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同多数固化的父亲一样，赫尔曼·卡夫卡始终不认可儿子从事文学创作，当儿子满怀兴奋地把自已出版的新书交给他，无比渴望获

然乃至神秘的超自然相照。蛇蜥和树精的威权加大了“我”的不安，“我”试图找到自己，态度愈发决绝。“刀刃”和“脖颈”再现，诗人曾说“新月之刀/从高处爱着我/随时/可能落下/割断我的喉咙”，刀刃意指美丽的颈部的脆弱和危机，是对美丽人生脆弱性的暗示，而危机、无助和孤独往往在一起。

诗的风帆何处去

斯特朗德贝里的诗常常试图于黑暗里点亮什么。2023年的《我的风帆无处可至》继续探索生存的谜团。诗人很多，造就各式各样的诗。斯特朗德贝里的诗时空不只单一维度，而是打破了我小我和宇宙、人和其他物种、当下和往昔乃至未来的隔阂。

新诗集《当我成雪》(2024)的创作力来自宠物猫去世后的愤怒。上一刻在她膝上，下一刻消失，就在处处新绿的北国五月。“我对大自然的看法是它很美却残酷而包含死亡，其实我一直在写这个”。她相信灵魂的游荡和重生，消失的猫在诗中再现，渴望重回肉体。尽管大自然比人更强大，诗人说，“我的下方是死亡，上方是星星”。

她说，每首诗都让她自己惊讶，因为诗就在那里，只等她找到形式、声音和意义。她认为这归功于潜意识和“真正的我”，“我常常觉得这些诗具有我没有的知识，来自非常遥远的源头”。也许她想说，自己的意识给送到了遥远的地方，带着超自然力返回成诗，诗在地上活着，也靠近了虚无的时空。

年轻时在《哈兰德报》当记者的斯特朗德贝里梦想着文学。丈夫鼓励她辞职潜心创作。1984年她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一场朗诵会，得到乌尔夫·林德赏识，与这位瑞典学院院士成了一生的朋友。马悦然院士有意翻译她的诗，也成了她的支持者和挚友。有人曾提醒她别指望在小地方写出大气候。她对马悦然抱怨乡间的闭塞，他相当严厉地说，最好的中国诗人都住在偏远的山顶。

早期聚焦于情爱和男女问题的斯特朗德贝里逐步超越了性别，从日常和感性，从身体和灵魂出发，试图触及宇宙。将灵魂翻译成图像，表现存在那无法言说的神秘，领略万物一体之感。黑暗中透着星光，宁静里燃烧着黑色幽默。充满生活细节却已将隐私铁块股化成铁水，锻造成钢。她说，“我在生活和诗歌中越来越想压缩，只把最必要的留下”，又说“在整个生命中我一直重新开始”，曾经为爱抒情的文学少女，而今露出发魔女的气象。

得一声赞许时，他只是淡淡一句“放那里吧”，甚至并未放下手里正在玩的牌。在自己真正重视、视为人生价值所在之事上得不到最在意的人的认可，这让卡夫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笼罩成长之路的阴影并未消退，反而因这种挫败变得更加浓重。除了写作，卡夫卡尝试走的另外一条独立之路是建立家庭——他认为，与所爱之人走入婚姻，并顺利养育几个孩子，是一个人所取得的最了不起的人生成就。这种凡人多可完成的事情，在卡夫卡这里却无比困难，自身的畏缩、对世俗的违背、父亲的反对，让他的几段情感半途而废，只留下数以百计的情书供人感叹。正如《城堡》中的K，卡夫卡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尝试，却接连碰壁，无法抵达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地。

回到1914年的《审判》，小说行将结束时，K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大教堂中，听神父讲述了一个关于法律之门的故事，故事中那个在法律门前无限徘徊、用尽一切方法和一生时间都无法进入门内的乡下人，无疑是小说中身陷诉讼深渊的K的写照，但也映射出一个走在人生边缘、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实中的卡夫卡，以及从彼时到当下，一个多世纪里每个有着自己各式各样的人生难题的现代人。1920年，悄然走向人生终点的卡夫卡偶遇了一位同事的儿子，这位名为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少年将自己与卡夫卡两年多的忘年交往记录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完善了卡夫卡的形象。在这部《卡夫卡谈话录》中，卡夫卡曾说：“生活就是与他者共处，是对话。人们不能逃避这种对话。”这句话的深层蕴含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因为人生之于卡夫卡，某种程度上更像一种得不到正面反馈的单向对话，其孤独可想而知。他也曾说：“人只有在爱情中和临死时才意识到自己。”尽管他在人生末年对雅诺施所表达的这些真知灼见揭示了他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在爱情与死亡之外，写作更是卡夫卡认识自己、表达自己的重要手段，并在此后岁月中，以此让更多的自我反观自己、思索世界。